

音乐家传记的新收获

——读《萧友梅传》

徐士家

近年来在学术著作出版不太景气的情况下,《萧友梅传》由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了,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,是我国音乐界的一件喜事,也是中国音乐家传记的新收获。

今年是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、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萧友梅诞辰 110 周年,萧友梅音乐研究会在他的故乡——广东省中山市举办了纪念活动。在这次纪念活动中,举行了《萧友梅传》的首发式,这无疑为整个活动增添了纪念的气氛。

我是比较早的就听说,廖辅叔教授准备要撰写《萧友梅传》。听到这个信息之后,我就认为由廖先生来撰写《萧友梅传》是最合适的。1927 年,萧友梅愤然离开北京,南下上海,在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下,创办了国立音乐院(1929 年后改组为国立音专)。廖先生是 1930 年 2 月任职于国立音专的,开始在图书馆工作,后来又改任文牍。从那时起,引用廖先生的话来说,就“在他的耳提面命之下,开始我在音乐教育机关的漫长的经历”。就在这“漫长的经历”中,廖先生亲见亲闻萧友梅在国立音专办学过程中的许多事情,今天写起《萧友梅传》来,自然会得心应手,有些事情能够说得清楚,说得准确,也看得透彻,比起别人写作《萧友梅传》来,当然“不至于像是隔靴搔痒”了。

《萧友梅传》共有十二节,每节的字数都不算多,全书也只写了五万多字,似乎单薄了一点,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读完之后,就会觉得这本传记的份量是比较重的。文字简炼、流畅,叙述生动,作者非常动情地给读者讲述萧友梅的一生。这本传记所写的每一件事情在萧友梅的一生中都非常重要,除了一些事情是作者亲见亲闻之外,有些事情是作者经过调查,或者找萧友梅的亲属核对过,或者参考了别人的回忆材料,总之,史料是非常扎实的。这本传记把萧友梅为我国音乐教育事业不断追求、呕心沥血、任劳任怨,以及他在日常生活中的那种朴素平实的一生,真实而又鲜明地反映出来了。

《萧友梅传》所写的事情都是实实在在有过的,正如作者在“后记”中说,“我现在记叙他的生平行事,自然不敢搬弄什么花言巧语,更不敢添枝加叶”,“而且保证没有什么水分”。正因为如此,真实可信是这本传记最显著的一个特点。作者认识萧友梅,是在 1927 年后为他的哥哥廖尚果(即青主)送信给萧友梅时开始的。萧友梅与廖尚果是留德时的同学。那时,萧友梅“有空也不时来看青主,有时还留下来喝杯咖啡或者吃晚饭”,此时作者“才有机会插上几句话,知道他生平的一些事情”。萧友梅 1901 年从广州时敏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,1906 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后,便成为革命的战斗的同志。由于萧友梅是学习音乐的,政治色彩比较淡薄,不会引起警探的注意,

因此他的住处就成为孙中山、廖仲恺等人聚会的地方，他还抱着廖仲恺与何香凝的孩子到门外去，为他们担任望风的任务。1912年后，萧友梅离开总统府后想去德国研究音乐与教育，孙中山是关心过的，并批示教育部帮助他们想办法。此事后来在教育总长蔡元培主持工作时才办成。萧友梅的家庭景况不大好，人口多，开支大，他在留德时要从每月领取的官费中拿出一部分寄回家中贴补家用。这样的事例很多，我想大概都是作者在与萧友梅的交往中所知，当然是可信的。

这本传记所写的一些事情，作者是做过调查的，是核实过的。比如，萧友梅的出生地问题，过去有的文章多数是说他出生于澳门。作者认为，一是他根据萧友梅的自书履历手稿看，萧友梅是五岁离开香山去澳门的；二是他问过萧友梅的侄女萧淑娴教授，她断言她的叔叔是出生于香山。因为她问过她的姑姑，即萧友梅的妹妹。又比如，1906年底至1907年初，当时清政府咨请日本政府协力缉拿孙中山。为了逃避清政府和日本警探的追捕，孙中山最后躲在萧友梅的卧室，饮食生活全由萧友梅包了下来，直到1907年3月孙中山离开日本去越南。在讲到这一件事情时，作者说，“孙中山避居萧氏宿舍的时间究竟是在哪一年，因为缺乏书面材料，一时还难确实。关于萧友梅的生平行事，我主要是从他的妹夫俞诚之那里听来的，当时并未问明是在什么时候”。可见作者所写的这些事情，是有事实根据的。

这本传记所写的另外一些事情，那是作者与萧友梅共事时的亲见亲闻。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之后，南京国民党借口军需供应紧张，减发经费。此时国立音专一方面不得不减员，一方面在职工作的薪水也大打折扣，特别是那些勤杂人员，平时收入就不多，再一打折扣，就更加陷入苦境。萧友梅考虑到他们的工作关系到学校局面的稳定，决定将自己应领的那份薪水分给那些贫苦的勤杂人员，好让他们安心工作。1934年2月，蒋介石发起所谓“新生活运动”，利用封建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，禁锢人民的思想和行为，让人民接受国民党封建买办法西斯的统治。为了大造声势，要艺术家写书。音乐家呢，当然要找上萧友梅了，但他不愿意写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只好指定别人写好后，要署上他的名字才够份量。这位替人写书的就是撰写《萧友梅传》的廖辅叔教授。当时上海有个音乐团体的负责人某女士，用英文写信给萧友梅，请他同意派音专的几位同学充实他们的音乐会节目。萧友梅一见信就火了，“明明是中国人给中国人写信，为什么不用中文？难道我们是大不列颠帝国的臣民不成？！”这些事情要不是作者亲见亲闻，一般来说局外人是很难知道的。

《萧友梅传》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叙述事情的时候，作者采用了夹叙夹议的方式，既把事情源由说得一清二楚，又表露了作者的是非与爱憎的观点。比如，在讲到萧友梅与青主的关系时，首先讲了事情的由来：1927年后，青主是南京国民党政府通缉的政治犯，而且是被汪精卫通电定为“著名共党”的。在那样一种情况下，作者替青主给萧友梅送信。然后作者感慨道：“在这样荆棘地的形势之下，他放心去找萧友梅，是只有相信他是可以交心托命的好人才会走这一步的。”于是作者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观点：“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，图官卖友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。”而且还列举了一个例子，北伐期间青主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，就是因留法同学的出卖惨遭毒手的。又比如，萧友梅从日本留学回国后，曾应清政府的留学生毕业考试，取得了文科举人的“学位”。对于这一件事情，过去有些文章说这是普通人所梦寐以求的，萧友梅却于无意中得之，很为萧氏庆幸。作者却说，“其实与其说是值得庆幸，毋宁说是委屈了他似乎更合适些。因为清政府当时所列的学科可以说是包罗万象，独独没有音乐。那么，给予一个文科举人，究竟算是优待呢，还是随随便便敷衍了事呢？”再比如，1925年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开除六位学生自治会负责人，引发了学潮，激起了鲁迅等教师的义愤，出来主持正义，指出杨荫榆的错误措施。而另外一些名流学者，除了马寅初、李四光等人在那张支持杨荫榆的宣言上签名之外，其

中也有萧友梅。作者分析说,萧友梅之所以签名恐怕李四光的态度起了一定的作用。因为李四光夫妇是萧家的常客。作者的观点是很清楚的,认为“哪里知道这个名一签,就意味着站错了队呢!”接着作者引用鲁迅对这一事件的看法,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:鲁迅是善于区别对待的,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打一气。他的主要论敌是陈西滢陈源。所以对李四光,鲁迅说,“因为我知道李教授是科学家,不很‘打笔墨官司’的,所以只要可以不提便不提”。对于萧友梅,鲁迅只说是“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”,同样也可以不提便不提了吧。这种夹叙夹议的叙事方式,生动活泼,将作者的是非与爱憎的观点,在这字里行间表露得多么清楚啊!

《萧友梅传》还选用了五十多幅萧友梅生前留下的相片,这是这本传记的又一个特点。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音乐家传记中,选用如此这么多的相片,还真的不多。如果我们仔细观看这些相片,对于萧友梅无论在日本或者在德国的留学生活,会留下较深的印象;同样也对于萧友梅呕心沥血所从事的音乐教育,可以通过他与当时一些教师与学生的合影,也会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其中有些相片已经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。比如1912年3月,萧友梅任职于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时,与孙中山、胡汉民、杨杏佛等人的合影。摄于1917年4月在波森布什道尔夫村马铃薯田上的相片,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萧友梅在德国留学时的生活情景。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,由于协约国的封锁,德国生活资料极度缺乏。面对绝粮的威胁,当时的留学生还是留在城市。萧友梅则不然,他把生活的重点移到乡下,波森布什道尔夫村正是他的定居地点。他扛着锄头,自己种马铃薯来保障自己的生活。在这张相片背后,他写首:“时因柏林绝粮,特下乡实行种马铃薯,是年收获至二千五百磅。”而摄于1923年11月北京大学管弦乐队全体合影的相片,则是萧友梅回国后任职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时,中国人自己组织管弦乐队的真实写照。作者说,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几次中国人搞西洋乐队,由于种种原因后来都没有了。这次萧友梅经过努力,终于因陋就简,乐队也就凑起来了。“这样总算开始有了一个人组织,中国人指挥的具体而微的管弦乐队”。至于音乐会的影响,作者说,当时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听了这个管弦乐队的音乐会之后,称赞是“中国新音乐的曙光”。这对萧友梅来说,无疑是受到一次极大的鼓舞。此外,上海国立音乐院开院纪念的相片和萧友梅与黄自等人合影的相片,都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。因此,我认为一本传记如能慎重地选用一些相片,有时比文字更能说明问题。

《萧友梅传》选用萧友梅的长子、意大利米兰美术学院教授萧勤的两幅画作为这本传记的封面和封底。封面画为“永久的花园之三十三”,封底画为“大限外之六”。这两幅抽象派油画,真让人思索万千,别具一格,为这本传记增添了色彩。至于说《萧友梅传》有什么不足的话,我想主要是有关萧友梅在音乐创作方面还可以提供更多的情况。尽管如此,《萧友梅传》仍然是目前在中国音乐家传记中写得极有特色的一本。

读完《萧友梅传》后,除说了以上一些话之外,还有一些问题仍然在我脑海中思索着。(1)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各个历史时期,为音乐事业作过贡献的音乐家不少,我觉得应该为这些音乐家立传。但是,这在极“左”时期是不可能做到的。今天党和政府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民主气氛浓厚的新时期,我想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撰写音乐家传记,并能得到及时的出版。(2)音乐家传记是属于人物传记一类的,真实性与可信性是极为重要的。那种不顾历史事实的、任意添枝加叶的传记,我认为终究是没有生命力的。除了真实性与可信性之外,传记的写法尽可以是多样化与多风格的。我预祝有更多的音乐家传记问世。